

示威者，但他認為，這種個人關係幫助化解了隨後出現的中美關係嚴重危機。布什認為，正是因為他認識和了解中國領導人，他才會在「六四」事件之後，盡他最大的努力，來維繫十分脆弱的中美關係（頁460）。

布什在中國的經歷，使他從內心認識到，不是所有其他國家的人都像美國人那樣看問題。可以說，他剛到中國時，還是個外交新手；

離開中國時，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國際問題觀察家和外交家。這一切為他成為一個有全球視野和國際影響力的總統打下基礎。中國日記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布什後來擔任總統時的政策、他的思維方式和政治手腕，有利於公眾更好地認識他擔任總統時應對重大國際危機的策略和手段。本書自2008年夏出版以來，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

## 從社會文化角度解讀民國政治

### ● 王龍飛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繼《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2003）、《中國近代通史》第七卷《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2006）之後，王奇生於2010年再推出一部民國史研究新作《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以下簡稱《革命與反革命》，引用只註頁碼）。正如副標題所示，本書以社會文化為觀照角度，落腳點為民國政治，其時間上限為新文化運動，標誌性事件是《新青年》的創刊，下限至1949年國共政權交替。

民國時期，「革命」與「反革命」的不確定性反映了當時各政治團體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和規劃的不同考慮，也體現出幾種政治勢力關於社會主導權的激烈爭奪。

王奇生以「革命與反革命」為標題，可謂以高度簡約的方式提煉出

儘管三大黨派各有主張：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產黨的「階級革命」、青年黨的「全民革命」，並且迴圈敵對和相互抗衡，但他們在「革命」這個問題上沒有分歧，一致認為當時的中國非一場大革命而不可收拾。

了民國中後期中國政治的基本形態。從詞義或邏輯上講「革命」與「反革命」並無善惡或對錯之分，與「黑白」、「長短」、「大小」一樣，只是一組相對的概念。然而在民國，由於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以及青年黨三大黨派的大力宣導，「革命」一詞風靡輿論界，並且「迅速匯聚成一種具有廣泛影響且逐漸凝固的普遍觀念」（頁67），進而形成了一種「革命高於一切」的社會價值評判標準。與之相隨，「反革命」這一本為蘇俄布爾什維克的譴責性語詞迅速升格為一種「最惡之罪」。三大黨派因為政見不同，很容易認為自己是真正「革命」的，而對手則是「舊革命」、「半革命」、「假革命」，乃至最高級——「反革命」。在這個意義上，各黨派的政綱和行動究竟是「革命」還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也就無從評判了，以至於對「革命」的闡釋權和話語權成了各方爭奪的重點，因為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是「真革命」、「最革命」，並且可將對方置於死地。這種「革命」與「反革命」的不確定性反映了當時各政治團體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和規劃的不同考慮，當然也體現出幾種政治勢力關於社會主導權的激烈爭奪。

儘管三大黨派各有主張：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產黨的「階級革命」、青年黨的「全民革命」，並且迴圈敵對和相互抗衡，但他們在「革命」這個問題上沒有分歧，一致認為當時的中國非一場大革命而不可收拾。這自然將問題導向了另一端：為何中國需要一場革命？這種共識又是如何產生的？該書用了開頭的兩章來回答這個問題。「革命」

的另一種表達是「社會改造」，而這又應追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就是本書的論述起點。作者認為：「《每週評論》和《新潮》的相繼創刊，結束了《新青年》孤軍奮戰的局面。三刊同聲協唱，同氣相求，很快產生了群體效應。」（頁23）並且，《新潮》的創刊意味着數量龐大的學生群體開始加入到這場運動中來。再接着，全國各地的學生團體在短期內辦起了約四百種白話報刊，新文化被真正「運動」起來了；「新文化」由少數精英的鼓吹發展為知識大眾的唱和，一場被胡適認為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運動真正展開了（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載《胡適文存》，卷四〔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頁152）。

隨着形勢的發展，這場運動也開始分化為「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當知識份子認識到社會是政治的基礎時，「文化運動」自然走向了「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要旨便是「社會改造」，其對象理所當然地是令許多人痛心疾首的仿如「一盤散沙」的中國和「烏合之眾」的中國人，其目標也很明確——動員組織群眾。作為現代的政治組織方式，政黨是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必由之路。而民國初年的政黨體制已為五四知識份子所厭棄，來自俄國的、已顯示出強大能量並有成功經驗的列寧主義政黨模式正好迎合了這種時代需求。

1921年成立的中共和1924年改組的國民黨都「以俄為師」，以至於被稱之為「一根藤上的兩個瓜」（章開沅：〈序〉，載《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頁3)。孫中山明確地說學習俄共不是學習其黨義，他認為三民主義更適合中國，俄共的優長在於強大高效的組織動員能力，而這正是國民黨最迫切需要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7）。就對於組織的認識而言，中共走在國民黨的前面，在程度上也更加深入。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大）制訂的黨章基本照搬俄共1919年的黨章，確定國民黨的組織原則為「民主集權制」，明確強調重心在「集權」，而中共於1922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大）上制訂的黨章比俄共1919年黨章所規定的更謹嚴，自然比國民黨更強調集權和紀律。並且，中共在黨章之外還通過了一個組織章程決議案，內中強調：「凡一個革命的黨，若是缺少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與訓練，那就只有革命的願望，便不能夠有力量去做革命的運動。」（頁63）相較國共兩黨，青年黨在這個問題上明顯功夫不夠。至此，三黨在未來的角力態勢似可初見端倪。

本書第五至第十三章則致力於分析檢討國共兩黨的組織運行實態。中共方面，作者以上海地下黨為例，探討了黨組織在城市發展的模式和道路；以廣東地下黨為例，剖析了黨組織在鄉村的遭際和應對。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廣東，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中共均發現實際情況與想像中的大有距離，迫於種種現實困難和考慮，許多時候不

得不偏離乃至違背組織原則。書中對於正統意義上的執政黨——國民黨的考察就更仔細，國民黨最高權力機構的演變反映了其內部複雜的權力鬥爭；高等學堂裏的政黨及政治則折射出其相容並包的態勢；戰時國民黨的政工與黨務工作則陷入了嚴重的困境；對日的湖南會戰暴露了國軍虛弱的作戰能力；國統區縣及以下的政治狀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且多是惡化。

## 二

章開沅在王著《黨員、黨權與黨爭》一書的〈序〉中寫道：「以國共兩黨的歷史而言，受兩黨數十年政治競逐和對立之浸染，廁身於不同政治環境之下的海峽兩岸學者對兩黨歷史的論斷即存有甚深的歧見。即令以客觀嚴謹相矢的純正學者亦難免殘存意識形態之餘緒和政治情結之遺風。」（章開沅：〈序〉，頁1。）實際上，治政治史的難處還不止史筆能否撇開主觀因素，更在於政治作為人類社會形態的上層建築，其實際運行情況極為複雜多面，即便是當事人都難窺全豹，更何況處在另一個時空之下的後人？而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史研究大多着眼於政令、文書、職官、函電、重大事件等要素，近現代政治史的研究範式則更加趨於統一和標準化，甚至有正式的、不容隨意變更的權威文件予以確認。這些標準一開始只是標準，進而則可能成為一種思維定勢，這導致多年來政治史研究

《革命與反革命》的社會史視角是相當可取的。無論是對中共在上海和廣東的組織建設的考察，還是對國民黨的黨務工作、大學中的黨組織、戰爭中的表現，以及基層政權的探析，都是這一視角的實際踐行。

《革命與反革命》所關注的一些問題及相應的結論，一方面豐富了民國基層社會的圖景，更重要的是對於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政治有着更多維度和面向的折射，這些都有利於對歷史進行更準確的把握及更深入的洞察。

不盡人意，曾經的「顯學」日漸成了「冷門」，「眼光向下」的社會史研究反而蓬勃興起。

關於社會史研究範式的優長和特徵，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有精妙的論述，他認為社會史學者常常要綜合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方法，因而經常面臨着如何調和和溝通這兩種不同精神探索模式的根本性不同，如中央化過程與地方化過程的不同，上層文化與大眾文化、機能與結構、歷時性與共時性、敘述與分析的不同 (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188)。從這個角度來看，《革命與反革命》的社會史視角是相當可取的。無論是對中共在上海和廣東的組織建設的考察，還是對國民黨的黨務工作、大學中的黨組織、戰爭中的表現，以及基層政權的探析，都是這一視角的實際踐行。

例如，書中提到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最初發現通過幫口工頭，組織工人非常容易，但很快就發現這種方式大大強化了工頭的地位與作用，相應地弱化了黨組織的威信，以至於出現黨組織被工頭脅迫的局面。這對中共來說是一個很重大和有益的教訓，對於後人理解中共初期的發展來說更是不可輕忽的 (頁139)。還譬如在經費的問題上，地方黨部竟通過向富有階層敲詐勒索來解決，上級黨組織通常也只得默許 (頁182)。就基層社會而言，《革命與反革命》所關注的一些問題及相應的結論，與杜贊奇等人對是

時中國華北農村的考察多有共通之處，這一方面豐富了民國基層社會的圖景，更重要的是對於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政治而言，則有着更多維度和面向的折射，這些都有利於對歷史進行更準確的把握及更深入的洞察。

作者還在〈前言〉中就民國軍事史的研究明確指出：「從社會史的視野研究軍隊的組織形態，以軍事為切入點來理解社會歷史，關注武裝力量與民眾之間的關係，均是軍事史研究的可能進路。」 (〈前言〉，頁6) 儘管政治是上層建築，但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還是人，「眼光向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把眼光投向人，聚焦更多的而不是少數的、普通的而不僅是帝王將相、實際的而不是符號化或數位化的、處於社會關係中的而不是孤立的人。

史料的運用也是本書值得借鑒之處。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檔案，不僅有大陸方面大量的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還有台灣方面的豐富館藏，藏在海外的《蔣介石日記》也得到了運用。有學者宣導歷史研究的「三重證據法」 (紙上材料、出土文獻、社會調查)，對於民國史研究而言，也應有多重材料，至少應該包含大陸的、台灣的以及海外的等三方面材料，如此則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於歷史真相。另外，作者在〈前言〉中惋惜地表示：「1980年代中央檔案館和部分地方檔案館合編的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不僅數量龐大，而且細緻生動，至今仍少為學界所關注。」 (〈前言〉，頁5) 可以預見的是，隨着思想的進一步開放，已有

的暫被閒置的資料也將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愈來愈多的新材料將被發掘出來和向公眾開放，相關的研究也將隨之升溫、走向深廣。

### 三

王著以扎實的研究和獨特的視角為我們呈現了一幅有深度、有廣度、重細節的民國政治圖景，所論給人以相當多的啟發。不過，以余之陋見，本書似乎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茲列陳於此，就教作者及方家。

第一，新文化運動的動力問題。本書中，作者將新文化運動作為分析民國政治的背景，並認為在新文化被「運動」的過程中《新青年》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其理由是在《每週評論》和《新潮》創刊之前，《新青年》處於「孤軍奮戰」的境地。筆者認為，《新青年》在這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當然不容忽視和輕估，但如果認為《新青年》是「孤軍奮戰」，似有失偏頗，因為近代中國思想輿論界的空前活躍並非肇始於此。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完敗於日本極大地刺激了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的民族自尊，無數人開始苦苦尋求醫國醫民之良方。「師夷長技」的破產讓先進的知識份子意識到「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梁啟超：〈本報告白〉，《新民叢報》，創刊號，1902年2月）。輿論驕子梁啟超1902年化名「中國之新民」寫作〈釋革〉，極力鼓吹革命，謂之「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梁啟超：〈釋革〉，《新民叢報》，

第22號，1902年12月）。刊載這篇雄文的《新民叢報》當時的印數已經近萬冊，而此時距其創辦卻不到一年，輿論界之活躍可見一斑。辛亥革命前後，輿論界再次大放光彩，社會思潮更趨進步。這些至少可以說明，《新青年》並不是「孤軍奮戰」，新文化運動的源流也應繼續向前追溯。

第二，疏於對中共基層政權的考察。本書用了三章（第十一至第十三章）的篇幅來考察國民黨的基層政權，而對於中共則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民國政治的主旋律國共之爭未能充分展現。對中共在上海和廣東的地下黨的考察，關注的僅是其初期的組織建設以及宣傳造勢，這與開闢根據地、建立政權的差別顯而易見。民國期間，在野黨的中共並非純粹意義上的「在野」，無論是大革命時期的蘇維埃政權，還是稍後的邊區政權，儘管或草創未就或夾縫生存，但對於中共黨的發展以及對當時和未來的政局都有着重要的影響。也就是說，中共政權存在的意義不可小覷，而其建立的過程、實際的運作、與國民黨政權的鬥爭等重大問題都值得深究。

第三，就討論民國政治而言，外部勢力的影響應是題中之義。有人謂二十世紀是「主義之爭」的世紀，唱主角的當然是以蘇俄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處在這個大背景下的中國，不僅脫不了干係，而且外來的影響極其深刻。本書若能給國共兩黨背後的那兩隻手多一點鏡頭，自然對讀者理解和把握民國政治大有裨益。

民國期間，在野黨的中共並非純粹意義上的「在野」，中共政權存在的意義不可小覷，而其建立的過程、實際的運作、與國民黨政權的鬥爭等重大問題都值得深究。